

翻譯與歷史的對話：建構臺灣翻譯史

主持人：臺北市立大學英語教學系陳宏淑副教授

與談人：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楊承淑教授
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橫路啟子教授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藍適齊助理教授
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王惠珍副教授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王梅香助理教授

時 間：2017年6月3日

地 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博愛大樓 504 演講廳



圖1 本論壇主持人及與談人：（左起）藍適齊助理教授、橫路啟子教授、楊承淑教授、陳宏淑副教授、王惠珍副教授、王梅香助理教授
資料來源：本刊編輯小組。

壹、前言



圖 2 陳宏淑副教授
資料來源：陳宏淑副教授。

陳宏淑副教授（以下簡稱陳）：各位與會貴賓大家午安，今天很高興能邀請到五位與談人來探討「翻譯與歷史之間的對話」。從早上到現在，一直環繞著如何讓翻譯與歷史產生跨領域的對話，讓翻譯學者從歷史學門學習到史學的研究法，歷史學者也可以將目光投注到翻譯這個領域，這是此次研討會非常重要的使命。長久以來，翻譯史研究仍多由翻譯學者進行，大家其實都在摸索當中，如何擁有比較紮實、整體性的研究法，要靠目前在相關領域耕耘的學者們慢慢建構。

此次論壇的子題為「建構臺灣翻譯史」，著重在 20 世紀從日治時期到戰後，這是過去歷史課本比較沒有描述到的時期，這段期間發生了什麼事，以及當時的歷史脈絡為何，是我們將探討的重點。本次論壇以此為主軸，希望能夠幫助我們更了解這段時期的譯者、譯事和譯史。

我們希望讓這些譯者重見天日，可以呼應到韋努蒂（Lawrence Venuti）所講的「譯者的隱身」（translator's invisibility），希望這些譯者長期以來的 invisibility（隱身性）能夠消除，重新被大家所看見（visible），藉由這場論壇，可以發掘歷史，幫助我們審視現在、展望未來。今天的論壇與談人非常特別，呼應了翻譯史研究跨領域的特色：有翻譯、歷史和社會學的學者，也有臺文背景和日文背景的學者。這五位學者從五個不同的角度觀看這一百多年間，臺灣翻譯史到底發生了哪些事，希望藉由他們的分享，能夠一一發掘出長期被遺忘的人、事、物。

貳、與談內容

陳：第一位與談人為楊承淑老師，楊承淑教授是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的所長，也是這二、三十年來，臺灣翻譯界的教母。很多人都是在楊老師的調教之下，才能在翻譯圈中貢獻一點心力，我們先以熱烈的掌聲歡迎楊老師。

一、臺灣日治時期譯史與譯者



圖3 楊承淑教授

資料來源：楊承淑教授。

楊承淑教授（以下簡稱楊）：講到建構臺灣翻譯史，必須回溯到日治時期，正好因為我主要的工作語言為日語，因此講到這個議題，我感到責無旁貸，至少在語言文字上具有一定的優勢。再加上討論到譯者與譯史，我也不應該迴避。但這是個困難的課題，大家從早上的論壇也知道，跨領域是多麼的艱難，我從事跨領域研究的起點是2011年，那時我到中研院臺史所擔任半年的研究員。我記得那時候歷史學者會問：楊承淑？她是誰啊？我自己從沒想過會踏進

臺史所，但是如果要做這個題目，就必須向歷史學者學習。不過我不像學校裡的學生有人教、有人可以問，我必須自己觀察、偷學，從2011年到今天，我已經寫了12篇相關主題的論文了。

我在這裡簡單介紹一下日治時期譯者和譯事活動的研究中，有哪些研究課題和方法。剛才介紹過研究的時間範圍是從1895年到1945年，但我最近的研究有點超出這個範圍，時間超過了1945年，那是因為當時的譯者（日治時期法院高等官通譯小野西洲）還活著，我連絡上小野西洲的兒子，他給了我小野西洲回到日本之後所寫的漢詩，今年6月我

要去日本宮崎，追尋這位譯者晚年的生活。我目前在研究的課題是日本譯者和臺籍人士之間的交友網絡，而我手上有小野西洲所寫的一百多首漢詩，我要拿來和他前期在臺灣所寫的漢詩作比對，從中找出譯者和臺籍人士之間的互動關係。

我們會發現歷史無法一刀兩段，無法有清楚的分野，至今日本文化、日本的制度對我們的影響處處皆是。各位可以去看看家裡的戶籍謄本和地籍，基本上和日本、韓國是一樣的，所以很多事情是連在一起的，並不會因為研究殖民時期的譯者而和現在的譯者毫無關聯。像我現在正在創造一種新的譯者身分，也就是國際醫療的譯者，我便會回想過去的譯者身分是如何建構的，我的興趣是譯者，所以我的研究目標是以譯者為中心，來了解譯事活動所顯現的角色功能，同時對照到西方的譯者和譯事，研究看看有什麼發現。我的另外一個興趣是現在和過去之間的聯繫，日治時期的研究可以用很多不同的角度切入，但譯者是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最鮮活的見證人，透過譯者的書寫和譯事活動，我們可以探索很多歷史。此外譯者是一個社會群體，比如法院的通譯就是一個群體，具有一定的慣習（habitus）或是活動的社會場域（social field），這當中有許多值得探索的議題。如果未來有機會，我希望針對譯者角色的理論化以及社會角色的脈絡化，進行深入的闡釋與描述。

我過去做過的途徑，在這裡提供給大家參考，我們可以從史料及文本來探索譯者的生平和譯事活動。翻譯學者從事譯者研究時，常被歷史學者質疑為什麼譯者研究沒有做譯者生平？生平年表在哪裡？如果都不管歷史學者的A B C基本功夫，會太異類而無法被歷史學者接受，所以必須具備辨別史料的能力，才能讓歷史學者覺得雖然我們有點另類，但可不是在胡說八道。另外在譯者行動當中，我們是有能力論述的，這就是我們的地盤。而譯者的書寫也是我們要去挖掘的，臺灣日治時期有通譯的試題，試題是一種史料，這些史料可以幫助我們探索統治現場常見的情境和語境。這個試題庫非常大，我做了1,000題，剩下的交給了我的博士生；此外我和我的博士生也做了「贊助人」的研究，有一些有趣

的發現；接著是譯者群體位置，尤其在法院，通譯少的時候有20幾個人，多的時候有將近60個人，這個群體所形成的角色和社會功能，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究；另外是從譯者與他者來探索譯者在文化事件中的角色和功能，我研究的是佐藤春夫，他在1920年來到臺灣時，不同譯者帶他拜訪了閩地的廈門、漳州等地，看到與臺灣不同的景象；還有從譯者的解讀與重構進而探索譯者的生產與再生產，譯者翻譯別人的遊記之後，再去到同樣的地方遊歷，寫下了遊記，從中探討兩者之間的互文性。

我目前正在做的是從譯者的人際網絡，以及透過譯者作品來梳理臺灣人和日本人之間的交友關係。目前所看到的材料多為殖民者所留下來的，所以臺灣人的蹤跡不是很清楚，特別是跟日本人之間有什麼樣的聯繫無法得知。很多史料都不是當事人所留下來的實際資料，官方資料更不容易看到其中的脈絡，所以我現在在漢詩、漢文上做努力。

由於我們不是歷史學者，要如何學習呢？首先是公文書，不管是官報、府報、公報、各種報紙、戶籍謄本或是地方志，這些公家機關所產生的文類都是我們的材料。私文書則有祖譜、分家鬮書、土地文書、日記、履歷表、帳本、書信、照片、風景明信片等，這些史料的運用現在比較方便了，可以從資料庫取得。另外一個就是口述訪談，中研院臺史所非常提倡口述訪談，我自己也做了很多，這部份不僅僅是歷史學者，社會學者也非常重視。

陳：謝謝楊老師，接下來的與談人為橫路啟子教授，她目前為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的系主任。研究專長為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學、日臺文化研究以及日中比較文學。延續楊老師對通譯者的研究，橫路啟子教授今天要談做為文化仲介者的通譯，在日治時期做了哪些事，我們歡迎橫路啟子老師。

二、作為文化仲介者的「通譯」

橫路啟子教授（以下簡稱橫路）：今天非常感謝有機會在這裡參加這麼有意義的研討會，也感謝楊老師當初邀請我參加讀書會。今天我



圖4 橫路啟子教授

資料來源：橫路啟子教授。

要談的是臺灣日治時期初期翻譯人員的研究，我要思考的問題是：在一個社會中，將翻譯當作一個行為時具有什麼意義？我思考的第一個問題是：人類是何時開始需要翻譯這項行為？應該是當兩個文化邂逅，且進一步產生溝通需求的時候。當我們看到「語言」、「文化」以及「溝通」這些字眼時，會以為這當中存在著現代化建構出來的平等、純粹的學術價值，不過回溯歷史的演變過程，不難發現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文化邂逅（衝突）時，總是帶來政治性及暴力的特質。日本帝國殖民臺灣的過程就是充滿著政治意識型態和暴力行為，殖民帝國為了將政治意識型態普及臺灣島內，便有了翻譯人員的需求。綜觀整個日治時期，對翻譯人員一直是有需求的，在初期的需求量最龐大，談到此次主題時，我就思考到這個部分。

在 1895 年日本統治臺灣初期，來臺的日本官員多是隸屬於海軍或陸軍，其中有很多翻譯官。日文所謂的「翻譯」是筆譯，不包含口譯。口譯在日文稱為「通譯」。我所接觸到的資料當中，留下名字的翻譯官或通譯官幾乎都是陸軍，換言之，日治初期在臺灣出現的日本翻譯人員都是軍人，可惜這些翻譯人員大多沒有用處，因為他們學的多是「支那語」，也就是北京官話。由於日本在殖民臺灣之前，並不了解這塊土地上的人民是使用哪些語言，因此他們來到臺灣之後需要借重「重譯」，也就是先從日文翻成北京官話，再請臺灣通譯翻成臺語或客家話，過程中的混亂可想而知，資料都有記載。例如，當時有一名右衛門名叫加藤元，他所撰寫的隨筆中，栩栩如生地描寫出當時實際進行翻譯的過程。他寫到 1896 年知名學者荒尾精先生來臺灣演講，先邀請總督府的翻譯官翻譯成北京官話，再請大稻埕的紳士劉廷玉譯成臺語，三個人都站在臺上，經過雙重翻譯進行演講，過程相當費時。

重譯不只是浪費時間，翻譯過程也會產生誤會及曲解，難免出現誤譯的狀況，不肖通譯甚至會趁機動手腳。於是總督府需要趕緊培養可以直接翻譯成臺灣話的通譯，造成臺灣人學習日語變成充滿政治色彩的行為。臺灣人學會日文，代表著社會地位提高、經濟狀況改善，但另一方面，譯者的形象卻變得很不好，當時報章雜誌稱譯者為「舌官」、「走狗」。非常有意思的是，當時的「偵探」和「舌官」被視為可疑又詭譎的職業，也許現在我們聽到「偵探」會聯想到推理小說，覺得沒什麼，但過去的偵探和通譯的形象是很不好的，尤其「通譯」又被稱為「舌官」。根據臺灣總督府所編撰的資料，通譯之所以這麼受人輕視，是因為這些人只要嘴皮子就能賺錢，而且他們被視為追隨侵略者又仰仗總督府權力來殘害一般老百姓的走狗，所以當時的翻譯行為和帝國權力有密切的關係。

現在學習語言或翻譯，包括口譯和筆譯，不再被當作擁有某種政治立場，單純是中立的行為。然而在日治時期初期的臺灣，非常清楚地顯示出語言學習和翻譯行為本身凸顯了某種意識形態／政治意涵。翻譯時常被比喻為兩個文化的「橋樑」，然而回顧歷史的各種場面，譯者往往無法站在兩個文化的中間點，或許可以說他們在兩個文化之間游移、漂泊，導致其主體性的分裂。當然，我們不應該全盤否認當時學習語言的人，其中還是有許多優秀的譯者，因此當我們思考翻譯行為時，必須要回到當時的情境，因為翻譯行為本身的意義時常受政治與社會文化的影響。

陳：非常謝謝橫路老師。剛才連續兩位老師都是在探討日治時期口譯員所扮演的角色，第三位與談人是藍適齊老師，他畢業於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學系，目前在政治大學歷史學系任教。他在這方面有多年的耕耘，我們在今天早上的專題也聽到藍老師針對二次大戰的戰俘和譯者所受到的待遇，有很深刻的描述，實在是意猶未盡，所以邀請他在論壇的時候多幫我們補充一些。歡迎藍適齊老師。

三、以「口譯者」的歷史作為臺灣史



圖5 藍適齊助理教授
資料來源：藍適齊助理教授。

藍適齊助理教授（以下簡稱藍）：剛剛兩位學者已經提到在臺灣史的脈絡之下，口譯者和筆譯者的相關研究。我是做歷史研究的，而今天設定的主題是以「口譯者」的歷史作為臺灣史，我想從三個層面來切入，第一個層面是從臺灣史的脈絡來看翻譯的活動和譯者；第二個層面是從臺灣史的研究方法和大家分享及探討；第三個層面則反過來，從譯者的歷史來看臺灣史。

就第一個層面而言，過去四、五百年來的近代臺灣史，很容易聯想到兩個主要的脈絡：「移民」和「殖民」。在這兩個脈絡下有一個很清楚共同點——臺灣史一直是在多元族群、多元文化下發展出來的。臺灣一直有很多使用不同語言的族群在這片土地上活動和居住。因為如此，口譯者在歷史上持續且必然地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臺灣史也能夠為譯者的研究提供非常豐富的材料。我在接觸了翻譯學研究之後，不斷跟歷史學界的同事和學生強調，臺灣就是一個 island of interpreters and translators，這是我被楊老師領進門，又有幸接觸更多學界前輩之後，所得到對於臺灣史新的理解和詮釋。

不過問題就延伸出來了，也是我想和大家探討的第二個層面：臺灣史的研究方法和學術史。如果大家同意第一個層面，我們應該會看到許多臺灣史學者研究譯者（特別是「口譯者」），可是到目前為止的成果仍然有限，或是還在發展當中。這是為什麼呢？我想從兩個問題來切入，一個是歷史研究的方法學，另一個是臺灣史的學術史。歷史研究的方法學一向以史料為基礎，也就是書面和文本的紀錄。口譯者相較於筆

譯者而言，比較少留下文本紀錄；因此要研究口譯者的歷史，材料的取得會較為困難。第二點是臺灣史的發展脈絡，戰後臺灣史一直受到政治、文化和社會等因素的影響，所以臺灣史的研究經歷過一段歷史學家所稱的，由「鮮學」到「顯學」，再到「險學」的過程。臺灣歷史的「主體性」至今仍在形塑與爭論當中，因此臺灣史研究仍有許多待充分開發的議題，「口譯者」的歷史就是其中一項。

至於第三個層面，口譯者的歷史對臺灣史而言有什麼意義？我認為第一個是以口譯者作為臺灣歷史研究的主體，一旦認知到口譯者的重要性，便會發現臺灣史的史料當中處處可見譯者的足跡。口譯者跨越了語言、文化、政治和空間界線，最能凸顯臺灣歷史是在各種內外不同力量交會之下所發展的結果，如同賴老師早上的研究報告，臺灣戰後所接觸到的譯本以及知識的傳播，有來自美國、日本和香港的影響；早上我提到的臺籍戰犯問題，不管他們是在澳洲，還是在馬來西亞／新加坡受英國審判，皆可以看到臺灣人作為被殖民者，與日本軍方、中國戰俘、澳洲政府、英國帝國勢力以及東南亞各國被殖民者之間的連結。透過口譯者的活動，可以清楚看到臺灣史的發展脈絡與主體性。第二點，雖然口譯者在實際活動中扮演關鍵角色，但是事過境遷，大多數口譯者被遺忘在後人的歷史書寫當中，然而晚近的歷史研究，例如英國著名的史學家 Eric Hobsbawm 則非常強調「小人物的歷史」。譯者和口譯者的研究，將歷史研究主體從大人物轉向小人物，更能發掘出歷史的不同面向。因此，我認為口譯者的歷史能幫助我們了解臺灣史中曾經出現過的許多小人物，還有他們的歷史意義。就像在今天早上精采的影片中可以看到，白色恐怖對於戰後翻譯產業的發展，竟有如此微妙的關聯，透過這些小人物口譯者，我們能夠對臺灣史的研究有更深入的認識。所以我認為以「口譯者」作為研究對象，能使臺灣史的研究更為豐富，我也希望臺灣史研究能對翻譯學研究有所貢獻。最後，在座的各位都是現在與未來的口筆譯者，你們都在撰寫臺灣史，我期待未來會有更豐富的臺灣翻譯史。

陳：謝謝藍老師。接下來我們要將時間軸從日治時期逐漸拉到戰後，下一位與談人為王惠珍老師，她目前任教於清華大學的臺灣文學所。剛剛三位老師著重的焦點為口譯者，接下來兩位老師會偏向筆譯者的研究，王惠珍老師所談的是日治時期到戰後的跨語世代，讓我們以熱烈掌聲歡迎王惠珍老師。

四、日治時期到戰後的跨語世代



圖 6 王惠珍副教授

資料來源：王惠珍副教授。

王惠珍副教授：大家好，我的研究領域為臺灣文學，最近比較關心臺灣跨語作家的專題，我研究的主題是日治時期龍瑛宗的研究，他活到了 90 歲，戰後文化活動及他的作品如何被翻譯出來，這個題目引導我進入了翻譯領域及跨語世代的研究。跨語世代如何因應臺灣情勢及時代轉變，進而使翻譯實踐對應到翻譯理論？而這樣的翻譯活動又有什麼歷史貢獻及文化意涵？我將在此進行簡單的報告。

自 1895 年臺灣成為日本殖民地之後，日語成為臺灣人的「國語」，臺灣人被要求成為「日本皇民」。1945 年 8 月日本戰敗，臺灣歸還給中華民國，成為其中的一省，中文變成臺灣人的「國語」，臺灣人被要求中國化，成為中國人。但臺灣人的母語從來都不是書寫語言，臺灣人的書寫行為在某種意義上，其實就是一種翻譯。每個時代的臺灣作家都有他們必須克服的語言課題，1925 年左右出生的世代，到了 1945 年是 20 歲左右的成人，他們受過完整的日語教育，所以日語是他們的書寫語言。臺灣政權更迭後，他們被迫重新學習中文，成為跨語世代，或者說是被語言跨越的一代。在臺灣文學界最常被提到的就是詩人林亨泰、陳千武，以及小說家葉石濤、鍾肇政等人，鍾肇政先生曾談到他們的跨語經驗即是「腦譯」的經驗。日語在臺灣的

文化歷史脈絡中與時俱變，成為被賦予了多重文化政治的語言，戰後國民黨的抗日史觀中，它成為臺灣人「被奴化」的表徵，但是在民間社會它卻成為反國民黨極權統治的軍事語言。到了 80 年代，臺灣在東亞文化區域中，日語又成為臺灣社群和東亞社群的共同語言。

目前臺灣國內相關的翻譯理論多源自於「英美文學」的譯介，運用在文化研究領域的討論也受到高度關注，翻譯研究甚至成為外文學門的顯學之一。然而外文學門的研究者大多聚焦在中國清末西學東漸的過程，分析西方文化知識中譯的現象；翻譯研究所則多關注中文怎麼外譯，較少關注到臺灣內部因殖民歷史所衍生的特殊翻譯現象。當我們重新關注臺灣文化史，除了關注中國、日本與西方等橫向的移植，更應該關注臺灣島內的跨語世代，他們在沒有專業翻譯訓練的情況下，如何利用前殖民者的語言進行縱向的文化繼承，以及橫向的中日翻譯活動。當我們重新探討臺灣的殖民歷史或後殖民文學譯本時，究竟該如何看待和評價這群譯者在戰前跨殖民地（trans-colonial），以及戰後跨時代、跨語際縱向繼承的翻譯活動？他們在此翻譯實踐當中，如何彰顯出譯者的能動性（agency），並建構臺灣民族文化的多元意涵？我認為應該讓這些譯者能夠「再現」（reappear），釐清臺灣作家在翻譯實踐上的文化特殊性，及其譯業對於臺灣新文學發展的歷史意義與文化貢獻。

我目前研究的譯者，像是葉石濤先生和鍾肇政先生，他們於 70 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之後，大量翻譯日治時期的文本，這些譯介在臺灣文學研究中相當重要，因為他們銜接了戰前的日語世代及戰後的中文世代。這些跨語作家因為語言的弱勢，在文壇中無法與中文流利的外省籍作家比擬，難以進入主流，翻譯反而成為他們展現文化能動性的重要資本。70 年代末，隨著臺灣經濟成長及本土化發展，臺灣知識分子重新「發現臺灣」，鍾肇政等人翻譯臺灣日語文學的文化實踐，進而嶄露頭角。80 年代東亞地區經濟快速發展，舊帝國日本亦挾帶新帝國的經濟優勢，擴展輸出日本大眾文化，葉石濤也藉由日語的文化資本轉換成經濟資本，展開東亞地區內的翻譯實踐。90 年代，臺灣文化民族主義者

因應建構臺灣文化主體性的需要，西川滿文學再脈絡化的譯出才成為可能，這些譯者無論面對戰前的日本帝國，或是戰後的國民黨極權統治，都藉由翻譯跨語越界，建構出臺灣的主體性，並且闡明自身文化的歷史性發展。

陳：非常謝謝王老師。接下來我們要以社會學的角度來探討文學作品，重新思考文學作品和社會結構的關係，特別呼應了早上賴慈芸老師談到的美國勢力在戰後如何影響翻譯發展。這個子題邀請到國立清華大學社會所博士，目前任教於中山大學社會學系的王梅香老師，請熱烈掌聲歡迎王老師。

五、臺灣翻譯史中的美國因素



圖7 王梅香助理教授
資料來源：王梅香助理教授。

王梅香助理教授：我開始研究譯者是因為研究美國權力的緣故，進而延伸到美援文藝體制下的文學翻譯，今天我將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待「譯者」。相對於藍老師是研究熱戰下的譯者，我研究的則是冷戰下的譯者。研究冷戰下譯者的困難，在於美國權力是 unattributed power（隱蔽權力），它不願被追蹤到其背後的來源，在運作過程中不斷地掩飾自己。

從社會學的角度研究譯者，首先要去思考這些譯者在何種社會結構底下行動？譯者作為行動者，如何回應社會結構？社會學者在社會科學訓練中被要求將研究材料「概念化」，透過這些概念和材料，社會學家嘗試回答社會學的基本議題，例如經濟理性、權力是什麼？而權力理論是我所關懷的重點，換句話說，譯者處於什麼權力架構下？翻譯具有什麼意義？這可以呼應到勞動研究當中，Michael Burawoy 研究工廠裡的工人在怎樣的權力結構底下工作；或是 Michel Foucault 研究監獄裡的權力

關係。我們透過不同的學門研究和材料，來回答社會學的基本議題。

我的報告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探討冷戰下的譯者身處何種社會結構？另一個則是他們在這樣的架構底下能夠做什麼？要研究冷戰下的譯者，必須先從整個國際局勢下來觀察。共產中國和自由中國都很努力的透過宣傳品和教科書醜化對方，而我們對於譯者的研究，也是放在類似的文化政治脈絡底下思考。此外，要探討臺灣的譯者無法和香港分開，因為在美國的文化宣傳中，臺、港是並置思考的，但更以香港為中心。臺灣和香港在世界地圖上雖然微小，但冷戰時期是美國在東南亞地區文學與文化的宣傳中心。

我的主要研究材料是美國的國家檔案（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NARA），整理出當時他們的譯書計畫（Book Translation Program）。早上賴老師有提到 1944 年費正清在上海已經從事了美國文學的翻譯，但當時香港的翻譯一直是一蹶不振的，直到 1951 年，美國新聞處處長 Richard McCarthy 想要重振香港美新處的譯書部門，透過翻譯計畫及美國文學來支持美國的外交目標，其實從現在的眼光來看，就是透過文化治理來正當化政治治理。Richard McCarthy 是一位在戰後對臺、港文學具有非常大影響力的美方官員，為什麼他會選擇「譯書」這個方式呢？除了譯書是美方的文化宣傳方式之一，也和他畢業於美國愛荷華大學，主修美國文學，以及他的老師是聶華苓的先生 Paul Engle 有關。當時有許多臺、港作家前往愛荷華大學取得學位，他們回到臺、港後，便憑藉愛荷華大學的碩士學位，在文壇佔得一席之地，愛荷華大學的經驗給予他們一定的文化資本或象徵資本。

譯書計畫一開始偏向兩個主題：反共與民主。子計畫主要有三個：資料服務中心的譯書計畫（The Information Center Service, ICS）、中國報告計畫（China Reporting Program, CRP）、臺灣報告計畫（Taiwan Reporting Program, TRP）。ICS 是常規的翻譯計畫；CRP 是中國的相關資料，往往偏向負面的宣傳；臺灣報告計畫則是報導臺灣，時間較晚，大概是 1960 年代。ICS 底下又有三個更小的子計畫，大多為英翻中，

也有中英對照，他們企圖透過語言的學習讓人親近美國，傳遞一種現代和進步的美國形象。我特別把張愛玲的《秧歌》提出來，她的作品也在ICS的計畫當中。CRP則是報導中國相關的訊息，針對的是全世界的讀者，他們將在地作家（local writer）所寫的作品翻譯成英文，讓全世界的讀者可以閱讀。TRP則是嘗試建立臺灣在國際上正面的形象。

此外，美國文學選集（A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是戰後臺、港教授們聯合翻譯的計畫，美國當時提供了不同書籍，主要由香港的新亞書院（今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群和臺灣大學教授群翻譯，這些譯者被單德興老師稱為「譯者的夢幻隊伍」。美國人選擇他們的原因是因為這些人具有語言資本，同時希望譯本能夠方便的流傳到校園。

譯者在這樣的結構底下可以做什麼？或許大家會認為在美援文藝體制之下，譯者沒有什麼能動性，其實不盡然。在官方檔案當中可以看到譯者向美方索取資料，他們接收美方提供的書籍，同時也會寫信向美方「主動」取得他們想閱讀的美國文學作品，甚至有時候不按照美方給予的底本，而是自己選擇想翻譯的作品，這些譯者雖然在體制下受到限制，但他們還是有種「不自由的自由」，盡量在體制下取得想要的東西。

美國新聞處對戰後臺灣的翻譯扮演推波助瀾的角色，如果要建構臺灣翻譯史，就必須考量到美援文藝體制的運作。因為美國的介入，這些美援文藝體制下的翻譯作品呈現出美國性、反共性以及「現代中國性」，塑造出一個相對於共產中國，更自由民主的「中國代表」。

陳：今天的論壇真的非常精采，如藍老師所說，從1895年到冷戰時期將近一百年的時間，基本上就是一部臺灣翻譯史，我們從口譯者和文學作品所留下的蛛絲馬跡中拼湊，試圖走回時光隧道，體會在當時的多語時代發生了什麼事。日語、臺語、中文、北京官話互相交流的情況下，產生了一個繁華似錦、亂中有序的社會。

我想要補充一下，剛才橫路老師提到「重譯」這個詞，通常有另一個詞叫「轉譯」，重譯是日文漢字直接過來的，中文的重譯有可能的解釋是，一本書過了20年重新再被翻譯，會有這種雙重意義，所以有些

學者喜歡用「轉譯」來避免意義上的誤解。轉譯不管在什麼時代一直在發生，例如口語的轉譯、文學作品的轉譯。如果源語文本不是主要語言，通常需要轉譯者居中進行翻譯。另外王惠珍老師提到「腦譯」這個詞非常有趣，現在網路世代常常有人說「腦補」，感覺可以互相呼應。接下來的時間開放給在場的同学、貴賓、前輩們提問。針對五位與談人的主題，歡迎大家提問。

參、現場交流與問答

陳：我想先請教王惠珍教授，您剛才提到作家時常身兼譯者，這在晚清的中國也很常見，但這些人比較喜歡被稱為作家，他們覺得當譯者比較丟臉，不曉得臺灣當時的譯者會不會有這樣的情形？

王惠珍老師：的確，這些作家在翻譯時通常不會用真名，而是像鍾肇政會使用「路人」等不同的筆名，葉石濤先生會用「葉左金」這個筆名。對他們來說只有寫小說才算是文學家，翻譯是次要的，所以他們不會用文學界發表的名字來翻譯，這也是造成譯者研究非常困難的原因。

武田老師：首先我想要感謝同步口譯員們的傑出表現，儘管如此，我可能還是沒能百分百理解王梅香老師所發表關於冷戰下美國勢力對翻譯的影響，所以還是想再請教一下。您剛剛提到的 ICS 計畫，二戰後美國接管日本時期其實也有類似的計畫，您是否打算擴大研究範圍，將日本這部分納入您的研究？因為類似的作法也曾在日本執行過，當時有許多翻譯人員來自 ATIS (Allied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Service)，他們在美國受訓成為戰時的日文翻譯官。在戰爭接近尾聲的時候，因為臺灣、韓國即將離開殖民母國統治，美國必須和他們交涉，所以也著手培訓中文翻譯官，所以我在想您是否考慮將日本也納入您的研究範圍？

王梅香老師：是的，如果有機會我會針對日本繼續做深入的研究。

陳：我想補問一個問題，王惠珍老師剛剛所提到的譯者使用筆名，某種程度顯示出，擔任譯者相較於作家而言不是很光彩的事情。這種現

象不僅僅發生在臺灣，中國晚清的文人筆名也很多，像包天笑的筆名就有一大堆。在日本，很多作家和譯者也喜歡用筆名，是否能請橫路啟子老師說說看日本的情況？是因為當譯者很丟臉嗎？

橫路：當時很多日本作家寫漢詩也會用另一個名字，所以並不是認為翻譯是次等才用筆名，而是想要轉換角色。此外，我這裡有個問題是關於譯者的「看見性」，譯者和口譯者是如何被看見的，我們一直有過類似的討論，我們發現譯者被看見的形象通常都不太好。例如這次研討會書展中陳列的禁書、偽譯，他們多以負面的形象被世人所看見。所以探討譯者「看見性」的問題時，我想要請教藍老師。

藍：我應該來發掘一下熱戰時期是否有譯者的下場是比較好的，但我現在看的都是戰犯審判的資料。不過可以跟大家補充一下，在日治時期早期，我們無法排除臺灣人願意擔任軍中翻譯，是具有一定的目的性，這些最終被判刑的戰犯無法被視為單純的受害人，過程中包含了非常複雜的因素，在某個時刻他們可能是主動的選擇翻譯，但因為時代一直在變，讓他們失去了控制權。這是譯者研究當中非常有趣的切入點，我希望未來能夠繼續發展這類議題，特別是臺灣的菁英們願意擔任軍中翻譯，其中一定有相當多的資料可以來探索他們的動機，說不定能發現部分「可見的譯者」是有好下場的。像楊老師研究從日本來臺灣的譯者，他們都有不錯的發展，對不對？

楊：是的，來臺灣的日籍譯者大都在臺灣展開了一段璀璨的人生，至於臺灣人擔任法庭譯者，根據我的訪談，好像後來也都不錯，他們累積了相當的經濟資本，變得頗為富有，基本上在日治時期能夠擔任法院通譯的角色，社會位階是相當高的。反而是經過政治板塊挪移後，日籍譯者回到日本，由於他們的文化資本是臺語，而臺語在日本是沒有用的，所以他們感到很無力。像是小野西洲晚年的漢詩作品呈現出低迷的風格，回想起過去又是意氣風發，如果不是我研究他，他的子孫都以為他只是個成天打小鋼珠的糟老頭。

至於筆名的問題，在我所研究的語料庫當中，有 1,500 多筆小野西

洲的作品，他的確會因為不同的文類或主題而使用不同筆名，這些筆名是有類別性的，至少在他身上可以觀察到這樣的特徵。

王惠珍老師：姑且不去談他們的下場，我讀過 80 年代鍾肇政和葉石濤的書信，他們很常提到：「翻譯費下來了，債終於可以償還了」這樣的情況。當時的譯稿費相當高，一本大概 2,000 塊，而他們當時的薪水只有一、兩百塊，所以譯稿費是相當重要的收入來源。翻譯的經濟效益是值得去探討的，要翻譯多少量才足以維持當時的生活水準，這部分可以進一步思考。

藍：關於稿費或酬勞，在二戰期間有一些被徵召到南洋從事通譯工作的臺灣人軍屬，每個人的月薪是 130 圓，此外還有加給；當時的政府公務員、或是小學代課老師的月薪在 40 至 50 圓之間。比較之下，不能排除經濟因素是擔任翻譯工作的可能誘因之一。

陳：晚清的包天笑在《釧影樓回憶錄》也寫得相當清楚，他就是為了掙錢，只要翻譯個兩部小說就可供好幾個月的開支，所以他寧可做翻譯，後來才去編書的。林紓更不用說，Michael Gibbs Hill 寫了一本書《林紓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暫譯）（*Lin Shu, Inc.: Translation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e*），裡面寫到他翻譯的量之多，賺的錢之多。反觀今日，翻譯稿費相當低，或許是因為早期外語人才缺乏，而現在外語人才多，價格就不免降低了，這大概也是一百年來的變遷結果之一。今天的論壇就到此結束，非常謝謝今天的與談人和在座的各位參與。

